

此後再無《皇華集》

■ 吳政緯

明清中國與朝鮮王朝往來頻繁，特別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藝術方面交流密切。儘管明朝、清朝時常合稱為「明清」，對於朝鮮而言卻是截然不同的「中國」。深入清朝與朝鮮之間的關係，難以忽略明代的中朝關係史。本文試圖從朝鮮將領李遂良（1673-1735）的一幅肖像畫談起，略述朝鮮時代的知識人抱持著怎麼樣的理想容貌，尤其是這個理想與明朝之間的聯繫。

本文強調，朝鮮與明朝存在高度親和的文化連結，這種連結的成立與斷裂，乃認識清代中朝關係史的重要背景。例如明代中葉以降，明朝改為派遣文臣出使朝鮮。兩國文人的詩文唱和，由朝鮮方面編輯出版，名為《皇華集》。該書是極佳的文本，具體呈現古代的兩個地域之間，如何超越語言、地理的隔閡，共同分享一樣的文明。《皇華集》是限於明代的出版品，在滿洲人入主中原之後，朝鮮對中國懷抱著截然不同的認同，不再出版《皇華集》。

前言

1728 年的春天，朝鮮半島的中部城市清州，爆發一場軍事政變。這場叛亂的目標是推翻朝鮮國王英祖李昞（1694-1776），另立新君。諷刺的是，起意謀反的李麟佐（1695-1728）與朝鮮王室系出同源，一樣出身全州李氏，為這場「李麟佐之亂」添上幾分族內爭權的色彩。

兵變伊始，李麟佐領導的叛軍進展順利，他們攻破清州，斬殺兩位將領。消息傳到漢城，畿輔大震，甚至宮城環衛亦嚴肅一時。國王李昞甫即位四載，年僅 34 歲，當天便下定決心，任命兵曹判書吳命恒（1672-1728）為四道都巡撫使，授予尙方劍，即刻出征平叛。（圖 1、2）

名將崛起

當時一位職司禁中防禦的將領也隨軍從征，名喚李遂良。他很早入伍，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舉武科，從部將做起，但是官運並不順暢，前往清州時已 55 歲。清州兵變是另類的良機，深刻地改變李遂良的命運，他在戰爭期間盡展才華，治軍則號令嚴肅，臨陣則身先士卒。生擒李麟佐的最終戰役，更是縱馬當先，叛軍見之驚懼，相與蹂躪而死者不可勝數，可見其英勇。

李遂良班師凱旋之後，國王在獻俘受馘的典禮上，坦承此前朝廷的左遷與冷落，著實愧對能人將才，待遇不公。英祖盛讚李遂良老而不衰，賜功臣號，封完春君。¹ 這份賜號封爵的榮譽，連同銘刻功勳的圖像一併傳世。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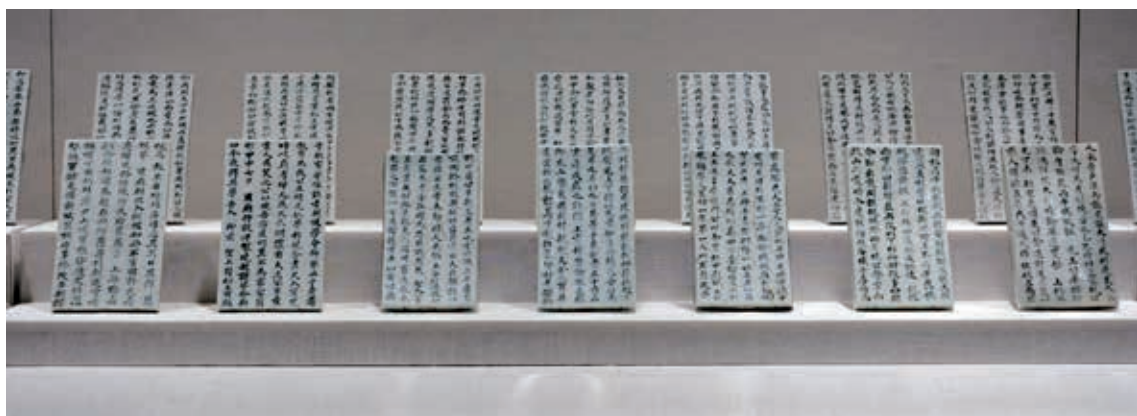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朝鮮時代 1751 海恩府院君吳命恒墓誌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1998.486.1-34 取自該館網站：<https://www.metmuseum.org/art/collection/search/49812> (Public Domain)，檢索日期：2023年10月5日。



圖2 朝鮮時代 1751 海恩府院君吳命恒墓誌 局部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1998.486.1-34 取自該館網站：<https://www.metmuseum.org/art/collection/search/49812> (Public Domain)，檢索日期：2023年10月5日。



圖3 朝鮮時代 1751 李遂良肖像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Asian Art Museum, Gift of Arthur J. McTaggart, 1992.203.a

落於美國舊金山的亞洲藝術博物館 (Asian Art Museum)，收藏一幅題寫著「完春君」的肖像 (圖3)，主角正是李遂良，他與其他14位功臣的圖像，將永存於朝鮮王朝的歷史中。

朝鮮與明朝的理想面貌

儘管此作大部分僅以線條描繪，卻也充分地傳達出朝鮮知識階層的理想面貌。如前所述，李遂良參與平叛剿賊，已經年過半百；畫中的

他鬚鬚斑白，眉角與額間的皺褶，頗添年歲。有趣的是這位久經沙場的老將，不以戎裝登場，而是頭戴烏紗帽，身披官服，腰束玉帶。我們自然能夠推斷，李遂良胸前難以辨識的補服，肯定是頭猛獸，代表他的武官身分。然而這幅肖像畫與文官肖像畫的距離也僅止於此，畢竟一幅臻至理想境地的朝鮮官員肖像，鮮少武官的形象。

現在來看第二幅肖像畫（圖4），這是朝鮮著名的文臣李書九（1754-1825），他出生晚李遂良81年。我們很容易判斷兩幅畫中的主角同屬一國，他們的區別，不過是文官的補服繡以飛禽，而非猛獸，以及彼此面容的差異罷了。理解此間相似性的關鍵是，人們以甚麼樣的姿態示人，往往取決於他們甄別美醜、判斷文明與野蠻的標準。因為裝扮與舉止的背後是一套文化，它巧妙地安排每一個細節的位置，彷彿理所當然。我們出席正式場合，通常無須提醒，自然優先考慮穿著襯衫、洋裝、套裝，這是不證自明的選擇。沉默的共識同樣出現在朝鮮官方委託繪製的功臣圖像，以及官員倩人完成的肖像畫上，他們共同述說朝鮮時代最美好的容貌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朝鮮將領、文臣身上的服飾，實乃徹頭徹尾的大明衣冠。² 例如正統二年（1437），楊士奇（1365-1444）、楊溥（1372-1446）等人，相會於楊榮（1371-1440）的杏園。是日的詩文唱和，以及記錄雅集的圖像，保存在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（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）的〈杏園雅集圖〉中。（圖5）另一幅則是弘治十六年（1503），以李東陽（1447-1516）為首的十位科舉同年，適逢聚會，延請畫工繪製群像，以茲紀念，是為〈甲申十同年圖〉。（圖6）顯然朝鮮人李遂良、李書九的形象，與明朝士宦無甚差別，直可闖入其中而毫無違和，哪怕他們其實相隔一、兩百年。



圖4 朝鮮時代 李書九肖像 大韓民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신수 1065 取自該館網站：<https://www.museum.go.kr/site/main/relic/search/view?relicid=1960> (Public Domain)，檢索日期：2023年10月5日。

一如中國

朝鮮人與明朝人在視覺上的趨同，是理解明清時期中朝關係史的重要概念。事實上這不僅是朝鮮引以自豪的表徵，也曾經是傳統中國知識階層辨別「文明高低」的度量衡。朝鮮是明朝的藩屬國，該國按照朝貢冊封體制的慣例，連年向中國的京師派遣使節團。明太祖（1328-1398）建都南京的歲月，朝鮮使節團先出義州國門，再一路南下，直抵金陵。明成祖（1360-1424）遷都北京之後，除卻明代晚期遼路斷絕的特殊時期，這條往返漢城、燕京的貢道逐漸



圖5 明 傅謝環 杏園雅集圖 局部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1989.141.3 取自該館網站：<https://www.metmuseum.org/art/collection/search/41478> (Public Domain)，檢索日期：2023年10月5日。

固定下來，成為朝鮮使臣慣熟的朝天路。

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），朝鮮使者金銑（生卒不詳）在北京發生一件另類的外交糾紛。外國使節例有入紫禁城，面聖謝恩的行程，為求

儀節得體，鴻臚寺設立序班一職，專門整飭廷殿儀禮。歷數明代朝貢諸國，朝鮮素來嫻熟禮儀，譽為小中華。豈料序班李時貞當著金銑的面，表示琉球、安南二國，冠服制度一同中國，而朝鮮冠服獨異。朝鮮貢使在京期間，序班隨同在朝天宮演練禁中禮儀，也參與禮部賜宴朝鮮的活動。經過此番觀察，李時貞直言：「諸官皆以為，朝鮮不及於琉球、安南二國。」³

其實琉球、安南使臣，不過是假著中國衣服，絕非該國常服。金銑力辯道：「安南不知義理，琉球則其俗無袴子，有同狗彘。」並云朝鮮則有禮樂文物，凡天文、地理、醫藥、卜筮、算律之書，一如中國。衣服則有朝服、公服、紗帽、團領，禮制少異而已。李時貞循此方知實情，感嘆「諸公之初所以指二國為優者，徒以冠服之同於中國也。」⁴ 凡此可見明朝方面以服著論斷優劣，以及朝鮮共享同樣文



圖6 明 甲申十同年圖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新 00200389 取自《維基共享資源》：<https://reurl.cc/o5V8D5> (Public Domain)，檢索日期：2023年10月5日。

化的事實。

明乎此，身著大明衣冠的朝鮮人，履及中國的使命，無異文化朝聖的行旅。根據統計，朝鮮王朝在明代至少派遣 1,252 個使節團，平均一年 4.6 次。⁵ 朝鮮赴京使臣的任務，除交涉各種外交事務，還包含學習中國最新的知識。朝鮮與明朝的正式溝通管道，仰賴文書往來，自須培養通曉明朝公文書用語的專家。於是每當遇到吏語方言未解者，便抄錄整理，差遣文官一員隨使節團前往中國，就地釐清語意，名之曰「朝天官」，後改稱「質正官」。⁶ 如此說來，朝鮮使者與明朝官員的關係，堪稱一道德、同風俗的典範，彼此皆筆寫漢字，戴冠配帶，親和熟悉宛若舊交。

明代中朝關係的融洽與發展，離不開朝鮮官方與兩班士族傾力學習漢文化的成果。明朝官

員眼中的朝鮮人，能夠按照朝廷的體例撰寫公文書，不需要翻譯官代為溝通，因為朝鮮的呈文，詞理通暢，一見便知。⁷ 朝鮮貢使不僅斐然成章，又工書法，筆墨俱佳。景泰元年（1450），景泰帝（1428-1457）親自閱覽朝鮮國遞交的表箋，感嘆道：「何以能書如此其細乎？」皇帝親自拿起表文時，左右官員從旁觀看，甚至表示「此紙無字」。顯見朝鮮人書寫細字的能力，令明朝君臣讚佩不已。⁸

但是朝鮮終究不是明朝，宗藩關係下的中國與朝貢國，關係再緊密也絕非一家。明代中朝關係步入穩定階段，是彼此一系列較勁、試探的結果。⁹ 明朝雖然未曾如安南之例，出兵干預內政，奉使朝鮮的宦官卻為非作歹，諸如騷擾驛站、勒索貢物，乃至無故發怒，剝去朝鮮官員的衣服，意欲笞之，無禮甚矣。¹⁰ 又如朝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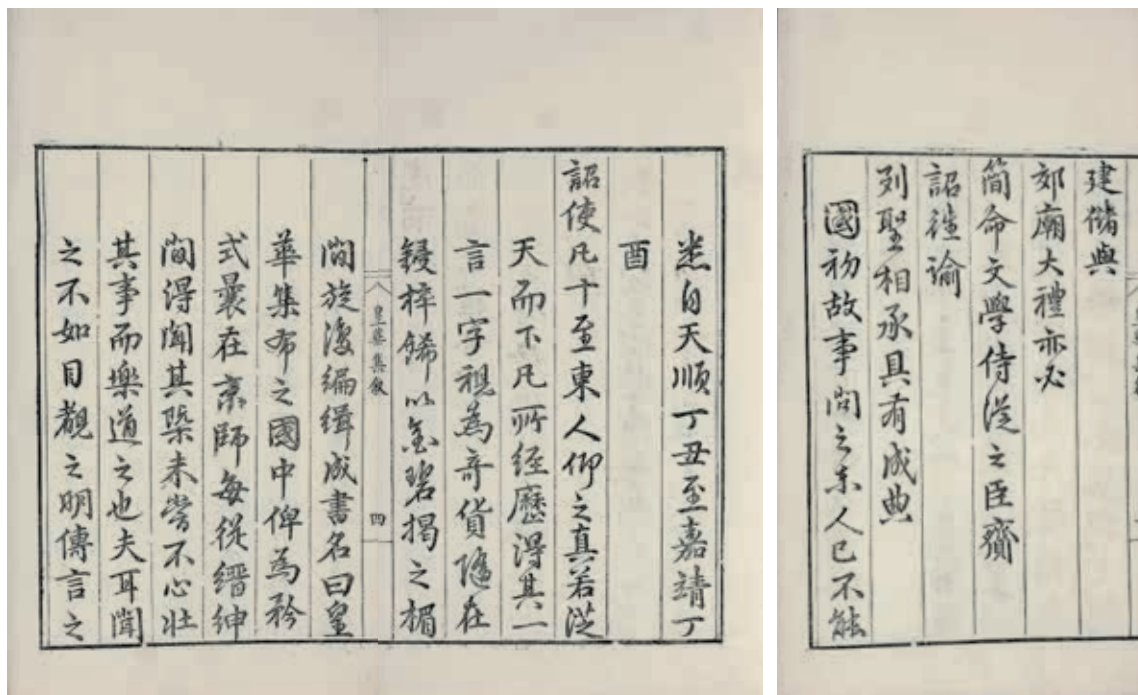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7 明 華察等撰 《皇華集》 〈皇華集敘〉 明嘉靖間（1521-1567）錫山華氏家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19136 ~ 01913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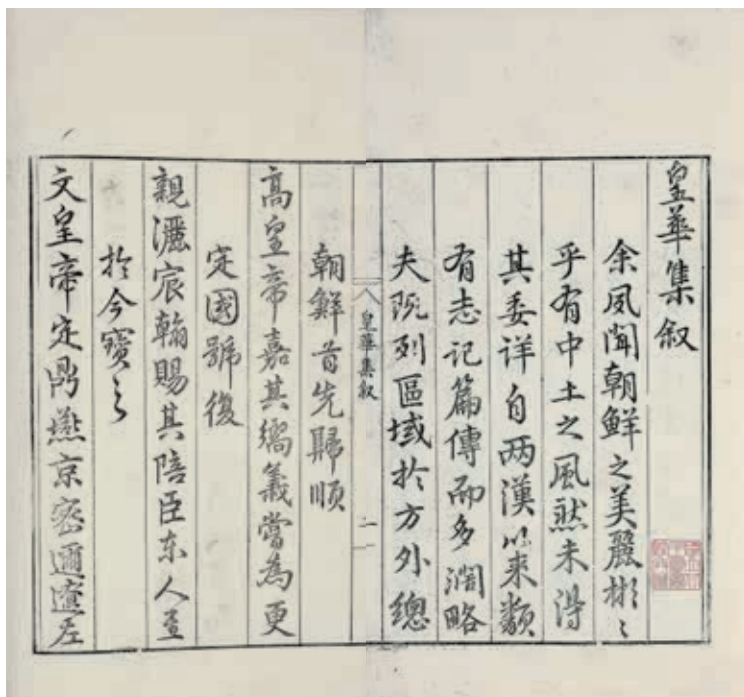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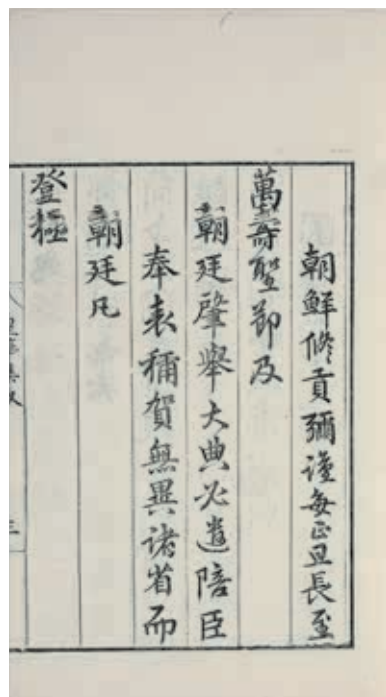
使臣金鉉回應明朝序班的質疑，曾云禮樂文物一如中國，不過是服制少有差異。其實朝鮮當然具有主體性，絕非毫無遲疑地接受中國文化。明代文臣出使朝鮮，注意到朝鮮官方接待時，由女性擔任禮儀人員，稱作女樂。明廷則自宣德年間起禁止，於是明朝官員曾經建議朝鮮廢除女樂。朝鮮國王卻堅持，「天使但頒詔而已，豈能改我國舊俗耶？」主張女樂不可廢。¹¹ 關注明朝、朝鮮的友好，亦不可忘卻兩國往來的磨擦與罅隙。

明鮮文學交流的象徵：《皇華集》

這種朝鮮知識階層對於明代中國的複雜心態，具體展現在《皇華集》中。論及明代的明朝關係史，首先浮現腦際的往往是壬辰戰爭（1592-1598），即豐臣秀吉（1537-1598）侵略

朝鮮，進而引發明朝、朝鮮、日本三方參與的東亞戰爭。在此之前，其實另有一個扭轉明鮮關係的事件：土木堡之變（1449）。明軍與瓦剌鏖戰於今河北省張家口一帶，最終明軍大敗，御駕親征的明英宗（1427-1464）淪為階下囚。

明廷在土木堡之變後，亟需穩定四鄰諸國。明代前期屢屢出使朝鮮的宦官，漸漸委由知書達禮的文臣出使。明代文臣奉詔前往朝鮮，首次便是正統十四年（1499），旨在宣諭景泰帝即位的消息。明朝使臣倪謙（1415-1479）是探花出身，司馬恂（?-1466）則為解元，與此前的宦官判若雲泥。更重要的是，始於倪謙、司馬恂的文臣外交，開啓明朝、朝鮮官員相互唱和詩文的傳統。朝鮮官方頗為重視此等「文事」，裒集雙方的作品，刊刻出版，名為《皇華集》。（圖7）



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《皇華集》記錄嘉靖十八年（1539），明朝派遣華察（1497-1574）、薛廷寵（1498-?）赴朝鮮期間，與朝鮮官員的文學交流。朝鮮方面對於接待明使，可謂如臨大敵。早在華察、薛廷寵抵達漢城以前，負責接待他們的朝鮮官員蘇世讓（1486-1562）已經向朝廷建議，「近來天使每以文字問事相尚，或耽於游觀，或樂於賦詩，故兩使預於房中，多數製述，一時俱出，即令和之，多有窘勢。自前以能文人混作醫生，出入窺覷，以贊助之。」或是以年少文臣，假以雜差奔走之役，以助詩文唱和。¹² 蘇世讓盼望朝廷捎來更多幫手，完成這場以文學為名的外交任務。

我們自然不可以將《皇華集》的記載，全都視作國交密切、往來無間的證詞。《皇華集》係由朝鮮官方編輯出版，專門收錄明朝使臣、朝鮮官員詩文的作品，是在特定條件之下，具備明確旨趣的文本。盛讚明鮮邦誼和諧，歌頌太平，自是題中應有之義。部分明使的無禮行為，即便得見於朝鮮史料，也會不露痕跡地隱身《皇華集》中。¹³ 但是將明鮮文人的交往，閉鎖於國家與外交的框架，等同抹去兩國文化親緣性的影響，無視兩群同樣穿戴大明衣冠的讀書人，分享的話語是可能超越國界的存在。

萬曆三十四年（1606），朱之蕃（1558-1626）、梁有年懷著皇孫誕生的喜訊，奉使朝鮮。¹⁴ 朱之蕃乃狀元出身，進士第一，造成朝鮮方面不小的壓力。負責接待的李好閔（1553-1634）先打起退堂鼓，自承「國家以臣為此任者，以臣粗解詞章。而邇來放冊已久，且蒲柳早衰，恐難支堪。」¹⁵ 等同未戰先降。相較於李好閔的氣虛，朱之蕃對朝鮮多所肯定；比如讚譽柳根（1549-1627）的詩作是「東方第一文章」，¹⁶ 驚嘆許筠（1569-1618）能夠口占對詩，

認為「此子生中國，亦當久在承明之廬。」¹⁷ 朝鮮士大夫並不遜於明朝文人。

驗證《皇華集》的真實性，另一個方法是檢視明朝文臣出使朝鮮後的反應。朝鮮使節團在北京的法定居所是會同館，根據「中國之法，不得與外人交通。」然而嘉靖年間，曾經出使朝鮮的官員如龔用卿（1501-1564）、吳希孟（1508-?）、華察、薛廷寵，時常造訪會同館，聯繫朝鮮貢使，並贈送禮物。究其原因，諸公「皆謂朝鮮禮義之邦，世為中國藩屏，何可以外人待之。」¹⁸ 連年造訪北京的朝鮮使者，以及隨侍明使遨遊漢城的官員，確實透過各種文化活動，獲致其他朝貢國未曾擁有的特權。

《皇華集》之後

這種緊密且複雜的聯繫，在 1644 年明朝滅亡之後更顯特別。如同本文伊始提及的李遂良、李書九，即便歷經明清鼎革的劇變，他們仍然穿戴大明衣冠，表現出自身最理想的形象。銜命赴京的朝鮮使臣也以同樣的裝扮，徘徊紫禁城，流連山海關，緬懷屬於他們與明朝的歷史。清代中朝關係史的序章，必須從此說起，明朝與朝鮮的糾葛與認同，奠定此後數百年的基調。

1811 年，朝鮮派遣以金履喬（1764-1832）為首的使節團前往日本，恭賀德川家齊（1773-1841）繼任幕府將軍。當時在掛川藩（今靜岡縣掛川市）擔任教授的松崎慊堂（1771-1844）以待讀的身分隨往，接待朝鮮使節團。松崎曾經讀過《皇華集》，詢問朝鮮使者道：「《皇華集》三十四卷，此間所傳至於天啓元年而止。入清後未得看一篇。續集印刷者今有若干卷？其最穎脫可觀者為誰也？」朝鮮使者應道：「天啓以後，更無《皇華續集》。」

松崎慊堂聞此，又追問是否「清詩不足取

乎？」朝鮮使者李太華報以更直接的答案：「以小事大，勢也。以詩相和，末節也。何必俯問？貴國亦應知我國冠裳。」¹⁹時值嘉慶十六年（1811），朝鮮使者仍舊身披大明衣冠，述

說自身的文化認同，畢竟清朝人已經剃髮易服，紫禁城亦非朱家所有。李泰華明確表示，縱使朝鮮使者在北京與清朝人有一二唱酬之事，此後再無《皇華集》。

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

註釋：

1. (朝鮮)黃景源(1709-1787)，《江漢集》，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(首爾：民族文化推進會，1999)，冊224，卷19，〈忠襄李公墓碣銘〉，頁389-392。
2. 關於朝鮮人穿戴明式衣冠，以及入清後成為展示文化認同的物質，見葛兆光，〈大明衣冠今何在〉，《史學月刊》，2005年10期，頁41-48。
3. (朝鮮)魚叔權(生卒年不詳)，《稗官雜記》，收入婁子匡、任東權、李元植編，《韓國漢籍民俗叢書》(臺北：東方文化，1971)，輯1冊8，頁53。
4. (朝鮮)魚叔權，《稗官雜記》，頁53。
5. 夫馬進，《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》(名古屋：名古屋大學出版會，2015)，頁4。
6. (朝鮮)魚叔權，《稗官雜記》，頁17-18。
7. (朝鮮)魚叔權，《稗官雜記》，頁62。
8. 相關研究請參李光濤，〈記朝鮮國「此紙無字」的表文〉，收入氏著，《明清檔案論文集》(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86)，頁939-943。引文均出自該文。
9. 葉泉宏，《明代前期中韓國交之研究(1368-1488)》(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1)；朴元燾(박원호)，〈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〉(首爾：一潮閣，2002)；范永聰，《事大與保國：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》(香港：香港教育圖書公司，2009)。
10. 孫衛國，〈明代宦官與中朝交往〉，《韓國學報》，11期(1992.6)，頁135-149；陳學霖，〈海壽——永樂朝一位朝鮮籍宦官〉，收入氏著，《明代人物與史料》(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01)，頁125-166。
11. 衣若芬，〈禮樂與女色：明代出使朝鮮文臣的「卻妓詩」及其影響〉，《域外漢籍研究集刊》，輯6(2010.5)，頁91-113。
12.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，《朝鮮王朝實錄》(果川：國史編纂委員會，1955-1963)，冊18，「中宗三十四年(1539)二月二十四日(癸亥)」條，頁255。
13. 杜慧月，〈歷史鏡像中的《皇華集》詩歌——《李朝實錄》、《皇華集》的互文閱讀〉，收入氏著，《明代文臣出使朝鮮與《皇華集》》(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0)，頁236-271。
14. 廖肇亨，〈從「搜奇獵異」到「休明之化」——由朱之蕃看晚明中韓使節文化書寫的世界圖像〉，《漢學研究》，29卷2期(2011.6)，頁53-80。
15.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，《朝鮮王朝實錄》，冊25，「宣祖三十九年(1607)一月二十三日(壬辰)」條，頁152。
16. 趙季輯校，《足本皇華集》下冊(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13)，頁2182。必須特別說明的是，這些詩作係由崔崑(1539-1612)代筆。
17. 趙季輯校，《足本皇華集》下冊，頁2183。
18. (朝鮮)魚叔權，《稗官雜記》，頁19-20。
19. (日)松崎慊堂(1771-1844)，《接鮮語語》，收入王連旺，《朝鮮通信使筆談文獻研究》(上海：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，2018)，頁92。